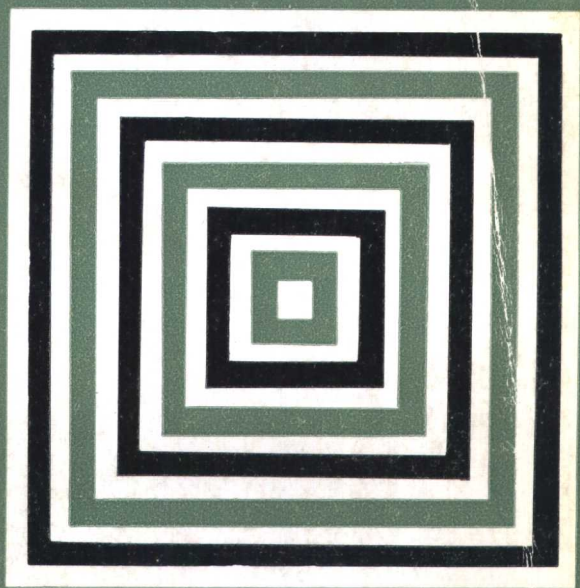


患難中的美國友人



著邁之陳 六九之書叢學文記傳



患難中的美國友人

陳之邁著

傳記文學叢書之六

傳記文學叢書之九六（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患難中的美國友人

定價新臺 五十元

著者：陳 之 邁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一三六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印刷者：華 成 印 刷 廠

臺中市平等街一二二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一日初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七一九號

患難中的美國友人 目錄

紀念一位美國的文人鬪士 Forrest Davis.....	一
國父的信徒威廉博士	七
記林白樂教授	一九
一九五〇年美國記者訪問團	二九
歷史教師麻倫先生	四五
美國參議員諾蘭	四九
賽珍珠	六三
美國參議員塔夫特	七五

布倫——美國的一位外交家	八三
美國參議員惠利	九三
蔣總統的美國友人：蒲立德先生	九九
美國反共鬪士：柯爾伯	一〇七
美國反共猛將：麥加錫	一二五
魯斯與中國	一三七
記厄特利女士	一五一

附 錄

艾奇遜與中美關係白皮書	一五七
試論拉鐵摩爾	一七五

紀念一位美國的文人鬥士：Forrest Davis

從本年八月十三日，臺北中央日報開始連續摘譯美國新近出版「中共游說團」一本書。這本書是亨特和戴維斯兩個人合著的，書前有現已退休的美國海軍上將雷德福的一篇序文。我這篇小文不在介紹這本好書，而在紀念這本書兩個著者之一——我的亡友佛瑞斯特·戴維斯。

我是在一九四四年秋間初次在美京華盛頓認識戴維斯的。那年六月下旬我從戰時首都重慶到華府我國駐美大使館任職。戴維斯是若干美國報章雜誌駐華府的特約通訊記者。他和他的太太時常是當時我國駐美大使魏伯聰（道明）先生和魏夫人故鄭毓秀女士座上的賓客。我第一次在華府雙橡園大使官邸見到戴維斯夫婦便覺得他們很不平凡。華府駐有許多第一流的新聞記者，一般而言，這些人和外國駐美外交人員往來，其最主要的目的是採訪消息，要求就時事發表評論。他們所注意的只是當天發生的事情，事情發生後幾個小時之後就不被注意了。新聞記者要緊緊把握着

時刻發稿，盡量搶先，爭前恐後，忙個不休，絕對沒有閒情逸致坐下來聊天，更無心深入的討論一項新聞的前因後果。

戴維斯不是這一類的新聞記者。他手裏拿着一杯威士忌蘇打酒，口裏含着一枝香烟，問長問短，從來不作任何筆記。他有時侃侃而談，討論盟國軍事外交的利害得失，滔滔不絕，完全忘記了他原是在採訪或訪問。因為戴維斯是很有學問，文學修養很深的人，對於一件事情他要尋根問底，非到得到了完全的了解不肯罷休。他不只是一個新聞記者，他也是一個作家。他的作品文字流暢優美，不是普通的新聞文字。他特別喜歡推敲字眼，有時用些很晦澀的字，常常語出驚人，為時人所傳誦。因為他有一枝生花妙筆，羅斯福總統當年曾請他代為撰寫文稿，此外許多華府政壇人物的文字多是他執筆的。他原來很敬佩羅斯福總統，但始終不同意羅斯福總統的親蘇政策。他早已料到戰後蘇聯坐大，對自由國家是個重大的威脅，故應早為防範，不可因為蘇聯是戰時盟邦而事事遷就，將來弄到控制不住的局面。就在這一點上戴維斯和羅斯福總統終於鬧翻了。

戴維斯是以寫作為生的。他經常接受各報章雜誌的邀約撰寫文字。題目是指定的，並且沒有一定的範圍。雜誌編輯約他寫稿並不是因為他對某一個題目有專門知識：專供大眾閱讀的雜誌是不要過於高深的文字的，專家對其本行所寫的論著只能在學術刊物上發表，銷路很廣的雜誌是不要的。這些雜誌所刊登的文字一般敘事翔實，言之有物，深入淺出，能夠引起讀者的興趣，適宜

於讀者茶餘酒後的消遣。寫這類文字須要高度的寫作技術，能夠收集資料，消化資料，組織資料，表達資料，把一件事情用優美的文字寫得有頭有尾，引人入勝。至於作者對這件事情事先有沒有研究，研究之後有什麼意見或建議是毋關宏旨的。美國銷路特廣的雜誌，除了文學創作外，大都以這類文字為主，稿費優厚。戴維斯正是寫這類文字的一把好手，因而成為享名的職業作家。

戴維斯的身材面貌不像一個美國人。他的身材並不高大而頭部特大，頗有點不相稱。他的膚色不潔白，也不紅潤，像是近東一帶地方的人。他的上唇留了兩撇八字鬚，鬚髮和頭髮都是漆黑的，既不斑白，也未脫落。我有一次同他開玩笑，說他有點像電影裏的中國偵探「查理陳」，誰知他告訴我演「查理陳」的那個演員死了之後，好萊塢真的來找過他去擔任這個角色。他的太太善於治家理財，常常嚴厲責備他的生活不規則，尤其是約束他飲酒。他們在華府使館林立的麻省大道有一所大房子，正在中國大使館館舍的對門。我時常在下班之後到他那裏談談天，遇到他夫婦吵嘴並且有時兩方面都要我從中調停，因此我對他們的家庭生活知道得很多。夫婦間的吵嘴爭的是些芝麻綠豆的小事，有人從中勸解一番也就和好如初。他們結婚多年，夫婦間的感情本是很好的。有一次我在調停時對他們說中國的夫婦間的關係最高的理想是相敬如賓，他們兩人忽然同時拍案大笑。戴維斯說：「夫婦的關係相敬如賓，等於我每天回家來待客，那家庭中還有什麼樂趣呢？」他這一問到把我問倒了。他的太太約束他飲酒，他問我中國的文人是不是很多喜歡飲

酒的，我只得說中國文人的確有許多歌頌飲酒的詩篇，並且循他之請譯了李白和陶淵明的兩首詩給他太太聽。這樣東拉西扯有時便可以把和悅的氣氛帶回到他們的家庭。他兩人不吵嘴了我們便可以談些正經事情。

我和戴維斯相交的十一年正是國際形勢波濤洶湧的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東歐各國之闖入鐵幕，中國大陸的淪陷，韓戰的爆發，蘇聯原子武器之試爆，以及許許多多危疑震撼大小的事情。戴維斯對於世局有沉痛的感覺。他時常對我說，他根本是一個西方人。他之所謂西方並不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而是西方文化的傳統，亦即是基督教的文明，其最大最深的含義是人性的尊嚴。他反對蘇俄，反對共產主義，口誅筆伐，並不一定是因為蘇俄可能危害美國的安全，因為他深深相信真的打起仗來蘇俄絕不是美國的敵手。他所大聲疾呼的是違反人性的共產主義對於西方文化的傳統構成一種嚴重的威脅。若果容許共產主義的毒菌在西方社會裡傳播，西方文化便面臨生死的關頭。所以他苦口規勸美國人民千萬不可對於共產黨徒和其同路人稍存姑息，隨時要鞭撻美國政府擔起維護西方文化傳統的重任，對敵人絕對不容妥協。他這本遺著「中共游說團」正是根據他的基本認識出發的：替中共游說的是共產毒菌的散佈者；牽引中共進入聯合國者是對敵人妥協的份子。爲了維護西方文化傳統，這兩種人都應當予以無情的打擊，都應予以澈底的撲滅。我每次和他談起這些問題他總是聲色俱厲，可見他所說的話是從他心靈的深處發出的。

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我在澳大利亞京城聽到戴維斯夫人以癌症而逝世。是年秋天我在紐約聯合國開會之後到華府去住了幾天，十二月二十三日有一位美國朋友約戴維斯和他在他家晚飯。我們已經相別七年了。他沒有一點老態，完全和從前一樣豪飲健談。但是兩杯威士忌飲下之後他不禁老淚縱橫，告訴我我是他畢生最好的朋友。自從他太太死了以後他只得把房子賣掉，獨自住在旅舍裡，夜闌人靜，清冷孤單。以前他太太和他囉嗦他總覺得討厭，現在沒人和他吵嘴反而感受到難以忍耐的寂聊。那天我們談天說地，他特別祝賀是我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所取得的勝利，叫我就聯合國一百零四個國家每個國家投票的情形爲他分析。在美國政治裡他是反對美國出席聯合國代表史蒂文生的。但是他滿口讚揚史蒂文生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的兩篇演辭，譽之爲義正辭嚴，情文並茂。

華府那時正當大雪之後，散席時已經午夜。我們同雇了一輛德士汽車，因順路的關係先送我到旅館。車到旅館門首時他特別下車來和我珍重道別。他說他的體力健壯，至少活到八十歲，他唯一擔心的事是有許多漂亮的寡婦追求他，「女人追求我我是沒有抵抗的，只希望不致於無條件投降！」

一九六二年五月，我在美國時代雜誌看到消息，戴維斯所住的旅舍着火，他正在睡眠，就在床上燒死了！五月十二日我寫了一封信給一位美國朋友，除了回憶往事之外，有幾句話意譯在下

面：

「我覺得戴維斯和斯本格勒 (Oswald Spengler) 與多恩比 (Arnold Toynbee) 是同屬一類的人物，雖則我對戴維斯的估價要比對其他兩人的估價為高。斯本格勒認為西方是在沒落之中。他盡情描寫種種沒落的跡象，但是他看不出有什麼法子可以挽救西方的淪亡。多恩比則以希望寄託在人類的改造，包括共產黨徒的改造。所以他不惜與共產黨徒打交道，妄想感化他們，他總以為有效的防衛是可以從有計劃的節節退讓而獲得成功的。戴維斯就不同了。他要對那些退却者作無情的打擊；他要對那些故意不正視危險的人宣戰。他要號召全面的防衛戰爭，他有充分信心敵人終歸要被殲滅。他的死使我們失去了一個最有鬥勁而同時最有才幹的勇士。這樣的人現在已不多了。」

我這封唁函經美國國會渥海歐州 (戴維斯原籍渥海歐州) 衆議院議員李勒 (Honorable Gordon H. Scherer) 載入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的美國國會記錄。戴維斯是一個優秀的作家，一個放浪不羈的文人，一個有學問有思想的鬥士。他的這一本遺著——「中共游說團」，正是他指向敵人心腹所施放的最後一個箭頭。

五二、八、一八。坎培拉。

國父的信徒威廉博士

國父民生主義第一講有下列一段：

「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深究馬克思的主義，見得自己同門互相紛爭，一定是馬克思學說還有不充分的地方，所以他便發表意見，說馬克思以物質爲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爲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位美國學者最近發明，適與吾黨主義，若合符節。這種發明，就是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

國父所提到的威廉氏是誰？他的著作是何名稱？普通的書籍均沒有詳細記載。一九三一年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肄業。有一天我的政治學教授羅卓士(Lindsay Rogers)對我說，他有一老朋友將舉行一個集會紀念國父，希望我去參加。我當即答應並依時前往，原來那個集會是

一位塞爾則 (William Sulzer) 先生所發起，到了一二十多人，地點是在他紐約市的寓所裡，其中的陳設都很古舊，但相當的寬敞舒適。塞爾則先生已年近古稀，瘦長的身材，滿頭白髮，行動似乎有點不大方便。集會開始，塞爾則先生起立發言，說他一生最大的幸運是有機會認識國父。他說國父早年往訪紐約，曾在他的寓所留宿，臨時時留下了一副袖扣。他當場把這副袖扣取出來給大家傳觀，並說他將以之傳給子孫，永遠紀念國父。他說國父是廿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現在北伐完成，國民政府成立，制訂訓政時期約法，國父領導的國民革命業已成功，因此他舉行這個集會，同申慶祝。他致辭之後即舉行茶會，大家閑談。我從來賓的口中獲悉，塞爾則先生一九一三年當選紐約州州長，後來因案卸職，退出政壇，即在紐約從事社會事業。

那次集會的參加者有一位威廉博士 (Dr. Maurice William)，經塞爾則先生為我介紹。我一聽到他的名字便立刻連想到民生主義第一講所提到的威廉氏，故率直的問他是否認識國父。他答稱他並不認識國父，但是他聽說他所寫的一本書「社會史觀」(“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曾為國父所引用。這個偶然的遭遇使我喜出望外，當即約期造訪，並以民生主義第一講有關部分譯出為他送去。

威廉博士是一位身材短小，壯健精幹的中年人，雖然帶着深度頗高的玳瑁邊眼鏡，但兩目炯炯有光。他說話的聲音宏亮，言辭肯定有力。他住在紐約市西五十七街二百號，是一所古舊的房

子。他是猶太人，原住舊金山。他少年到美東習齒科，畢業後就在紐約行醫。他接見我的地方就是他的診所兼住宅。看來他並不富有，他的收入料想只是附近一帶居民的診費，似乎不很充裕。那天我去拜訪他，談了些中國的時局問題。那個時候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野心已漸顯露，但「九一八」事變尚未發生。威廉博士一再表示希望中國有一個長期的和平安定，使得國民政府能夠有機會次第實行國父的理想和計劃，締造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我問他著作「社會史觀」的經過，他很謙遜的說，那本書是他少年時（一九二一年）所作，並沒有引起學術界特別的注意。他說美國人是不喜談主義的，他的書早已絕版。他萬想不到國父會看到他那本書，並且認為他的理論和三民主義，「若合符節」。

我和威廉博士的談話只有短短的半小時，即因有人來求診而終止。過了幾天我向羅卓士教授報告參加塞爾則先生紀念國父集會的經過，同時提及晤見威廉博士的經過。羅卓士教授頗感興趣，叫我去見哥倫比亞大學現代歷史教授蕭特維維先生（James T. Shotwell），向他說明這一段中美歷史的因緣。蕭特維維教授除了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研究部門的課程以外，並且是美國鋼鐵大王卡尼幾（Andrew Carnegie）所捐贈的「國際和平基金」經濟歷史部門的主持人，所以他對我所報告的各點覺得有作深入研究的價值。

一九三二年三月，蕭特維維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文科研究所發行的「政治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發表了一篇長文章，題為「孫逸仙與摩理斯·威廉」(“Sun Yat-Sen and Maurice William”)，其中除了敘述國父如何推重威廉博士的學說以外，並有以下幾段：

一九二四年八月，孫博士講述他的三民主義的第三部分，即是關於社會改革的部分。他的根據是威廉博士的理論……如此孫博士獨特的見解是導源於一位美國人對馬克斯的批判，而不是導源於馬克斯本人，因而使新中國所走的路線是肯定的反對共產主義的……

在現代政治思想中，很少有比這個問題更迫切的。這個問題不應當只從這兩位有關人物的角度來看。這樣看法是錯誤的。孫博士與威廉博士思想背景有兩個決定因素，即中國與美國……從這個觀點來看，孫博士之在三民主義中接受了威廉博士的理論正足以說明社會史觀的理論根據。這個理論發明了政治運動的一個關節，不是在生產者和剝削者的階級鬭爭，而是在整個社會本身主要的需要，亦即是說消費群眾的需要……

因此民生主義就確切的代替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從此我們看出，民生主義不僅是孫博士和威廉博士兩人意見的相同，而是美國與中國文化的合流，因為在這兩部文化裡，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才是決定的因素……

現在已經到了認識威廉博士溝通中美文化工作的時候了。孫博士在三民主義中已有了一個認識。究竟威廉博士的貢獻如何，只有歷史才能顯示。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我被徵調到華盛頓中國公使館去當臨時雇員，服務了八個月即行回國，因此也再沒有見到威廉博士，也沒有和他通信。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奉派到華盛頓在駐美大使館工作。我從重慶乘美國軍用運輸機經過印度、北非，橫渡大西洋，而到達紐約，轉到華盛頓。是年秋間我赴紐約，再度去拜訪威廉博士。他仍然住在那個老地方，仍然為鄰近一帶的居民治牙。我們兩人雖然只有十三年前一面之緣，但是他老人家還記得我，並即對我講說許多事情。他說在漫長的戰爭期中，他沒有一時一刻忘記了中國。在中國抗戰初起時他便參加發起捐助救濟中國難民的組織 (United China Relief)，珍珠港事變後工作尤為積極。但是這個組織不幸為左傾份子所滲透，幾乎被他們所把持。他又說他組織了一個「中山學社」(Sun Yat Sen Group)，主持者是孫哲生(科)先生、張靜江(人傑)先生、李石曾(煜瀛)先生，吳秀峯先生任中國秘書處的秘書長，威廉博士自任美國秘書處的秘書長。美國秘書處就設在他的寓所。他對我說：「中山學社」的宗旨是闡揚三民主義，促進中美友好。但是他鑒於中國共產黨破壞抗戰的種種事實，以及美國許多親共份子對中國政府的惡意宣傳，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喚起美國人民警覺中共的威脅，因為中共的陰謀，不但是要用武力奪取中國的政權，而且是根本反美的。倘若中共的陰謀得逞，「第三次世界大戰便不能避免了！」威廉博士說這段話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未結束，許多美國人士正在為中共竭力宣傳，而

威廉博士却獨排衆議，嚴厲的、正確的揭發中共的野心及其危險，真是令人衷心的敬佩。然而他又說他人微言輕，親共的勢力波濤洶湧，唯一的辦法是聯合美國有力量、有名望的人士，發起全美性的組織，喚起美國的輿論。他願爲這個組織竭盡他的力量。

從這次重聚以後，我時常和威廉博士見面。我每次到紐約例必約會和他交談，他偶爾到華盛頓來也例必和我晤面，平時我們也時常通信，交換意見。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他給我的一封長信可以看出他對當時時局的一般看法，茲擇譯數節如下：

在許久以前我便認爲在一個適當的時候，救濟中國難民組織應當予以改組，使其由一個慈善救濟的組織變成一個教育的組織，教育美國民衆認清共產主義的威脅。這個時機現在已經到臨了……

我雖然是這個救濟組織發起人之一，不幸得很，我發現改組這個組織是辦不到的事情，因爲……這個組織已被共黨及其同路人所滲透……而且主其事者有的是支高薪吃救濟飯的人……他們絕不肯容許這個組織變成一個以促進中美兩國人民加深瞭解的機構……

我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堅決相信我們必須另起爐灶，從新做起，找有影響力的人發起一個新組織，標榜一套新目標……

我想這個新組織最好的名稱是「中美民主同盟」……我們可以請社會上最有名望的人來